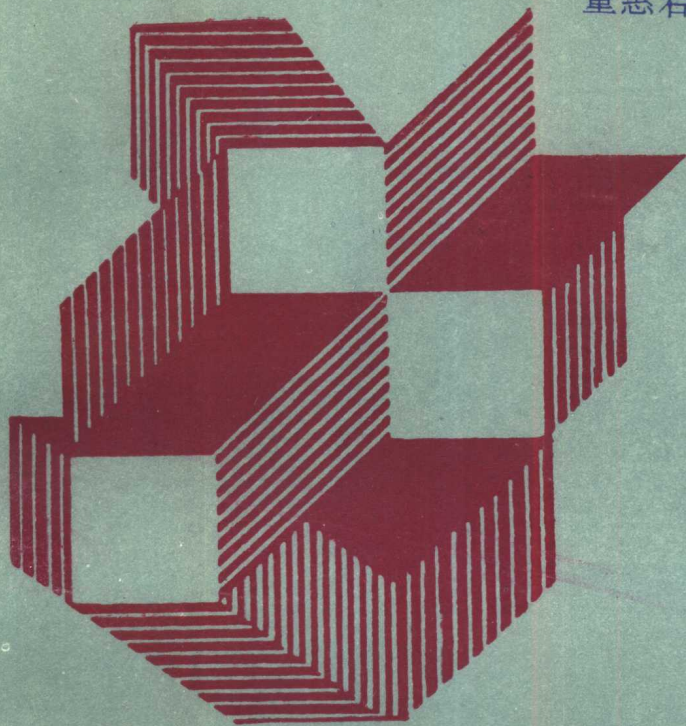


董惠君 编



文章写作

面面观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文章写作面面观

董惠君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33）

北京大兴包头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 6.625印张 141（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2.85元

ISBN 7-5040-0426-3/G·147

序

裴显生

近几年来，我国写作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现代化、科学化的宏观、综合之路，致力于写作基本理论体系和写作基本功训练体系的建设，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发表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出版了几十种专著、教材。这一成绩不可低估，应予充分肯定。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有些同志热衷于设计一个个新的理论框架，喜欢发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论”，而不注意总结当代写作实践的经验教训，不肯下功夫对写作学领域里的具体问题作深入的探讨。这样，“框架”虽新，往往是缺乏具体内容的空架子；理论虽“高”，往往是些脱离实际的空话。这样做学问、写文章，不免有“小本钱做大生意”之嫌。看来，在鼓励勇于创新的同时，有必要特别强调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求实精神。

由于从事写作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在阅读报刊时，特别注意读写作的论文，遇到内容扎实、篇幅短小的佳作，总是欣喜地收集起来，或剪贴，或复印，以便以后翻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在写作学界和我有同样习惯的同志很多，董惠君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惠君

洞志是一个老编辑，担任着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的职务。在繁忙的编务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写作学，是江苏省写作学会的理事。他在收集了大量写作学论文的基础上，选编出一本《文章写作面面观》，把复印件给我看，要我写点意见。这里面的文章，不少篇我以前看过，现在重读它，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少数篇章是第一次读，亦获益甚多。惠君同志把这些文章编成一本集子，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样的书，不仅可以帮助学习写作的年青同志认识写作的特点、规律，掌握写作技法，以求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写作能力，对于从事笔耕的记者、编辑、作家、机关文字工作者乃至写作学研究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名叫《文章写作面面观》，很有意思。全书共收入33篇文章，每篇文章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谈写作，力求谈深谈透。全部文章合在一起，又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写作学理论。这里涉及写作的特点和规律，涉及作者和编者，涉及选材、谋篇、用语、修改等环节，涉及叙事、抒情、气势、节奏、文采、文面等写作艺术，涉及科技论文、杂文、游记等文体……可以说，已经触及写作学领域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比较严密的系统。写作学论文很多，惠君同志只选这33篇，是煞费苦心的。在我看来，他不仅考虑到入选文章的质量，也力图体现出自己关于写作学的思路、布局和见解。这大概就是他的心目中的“文章写作学”。以他的素养和能力，是完全有条件自己来写一本这样的书的，但他没有写，原因很清楚，他是个老编辑嘛。对编辑们的劳绩，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

书中选入一些名家的文章，头两篇就是叶圣陶、吕叔湘

两位前辈学者的力作。这次重读，引起我的回忆。1981年夏，中国写作学会在北京召开常务理事会，请名誉会长叶圣陶先生到会讲讲话。原先，我们以为叶老已年近九旬，能来讲几句勉励后学的话，就是对学会工作的巨大推动。谁知叶老十分重视，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文章怎么写”的道理，对鲁迅先生《作文秘诀》中“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四句话作了精辟的阐述，并把它提到“作文要道”的高度，要大家“把这四句话记在心里，经常来提醒自己”。我们听的人都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为叶老的精神所感动。这次讲话的记录稿，经叶老亲自修改，以《作文要道》为题发表，成了写作学的重要文献。吕叔湘先生的《说“达”》，对《论语》中“辞达而已矣”这句话，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并由此出发，阐述文章写作的道理。这篇文章在语文学界已是脍炙人口，也是写作学的重要文献。我这里回忆的是文章发表前的事。《语文战线》编辑部的朋友要我请吕老为刊物写篇文章，我这个老学生写信向老师提出了请求，不久就接到吕老寄来的《说“达”》。在文章付排时，接到吕老的信，嘱我把文中的“如椽之笔”改成“生花之笔”，并改动文中的三处标点符号。过了几天，吕老又来信要我亲自看看校样，以免出错。读吕老的信，我为老一辈学者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所深深感动，并照他的指示去做了。现在，自己写文章时，也常想起吕老的教诲，不敢马虎从事。我想，读这个集子中名家谈写作的文章，不仅可以学到写作理论知识，而且可以学到他们严谨的治学和写作态度，从中领悟出怎样才能写好文章的道理。

肃清不良文风的影响，倡导踏实、严谨的写作作风，本

是写作理论中应有之义。前一时期，报刊上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术语轰炸，概念搬家”，貌似高深，实则言之无物，隐晦生涩，令人不堪卒读。有些人不肯下苦功夫研究问题，却又要“出风头”，发些“奇谈怪论”和玩弄文字游戏；有些人对这类“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文章，还盲目吹捧，引为时髦，竞相仿效。看来，对这股不正派的风文，确有“进行一次卫生大扫除”的必要。惠君同志在书中选入《文风不是私事》、《谨防新八股》两文，很有针对性。就全书来看，入选的文章，大都实事求是，言之有物，深入浅出，讲究辞章，以短小的篇幅表达厚实的内容。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那么编者正是力图用这样的好文章来影响读者，引导读者树立良好的文风。

在《文章写作面面观》交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上述零星感想。我希望今后有更多内容扎实，有新意、有深度的写作理论文章问世，为现代写作学大厦添砖加瓦，也希望写作学界有更多的同志做董惠君同志这样的有心人，注意收集、整理，编选出一本本高质量的写作学论文集来。这样，我们的学科建设才有可能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1989年9月15日于

南京大学北阴阳营宿舍

目 录

序	裴显生 (1)
作文要道	叶圣陶 (1)
说“达”	吕叔湘 (4)
谈“文成于难”	何其芳 (8)
逻辑与学术研究、语言、写作的关系	王 力 (12)
看·想·说·写	裴显生 (17)
编辑与语文	刘叶秋 (21)
写作与“把关人”	费晓平 (33)
写作与词汇	石定果 (39)
谈谈文采	吴调公 (50)
文风不是私事	吴伯箫 (54)
谨防新八股	马识途 (56)
真, 文章美的根	洪 珉 (61)
漫谈文章的气势	吴庚振 (73)
论写作艺术的节奏	郝 迟 (79)
漫谈材料积累	张慕勋 (90)
谋篇, 要胸有全局	丁 曼 (95)
文贵简洁	李保均 (100)
略谈语言的简约与繁复	石尚彬 (108)
文贵曲	李 蹊 张茂华 (112)

文贵精能变化·····	杨荫浒(116)
文见于此 起义在彼·····	赵兴明 刘绍本(121)
文章的过渡·····	黄宝兴(130)
谈谈叙述的立体化·····	邓嗣明(138)
抒情管见·····	凌焕新(144)
文章的标题·····	山 竹(151)
文章改中得·····	董惠君(155)
写文章要重视文面美·····	李硕豪 杨永信(160)
文章怎样才能写好·····	锡 金(165)
文章内外有功夫·····	董味甘(171)
“成如容易却艰辛”·····	汤国锐(174)
科技论文的写作特点·····	钱文霖(181)
杂文五味·····	黄阜才(186)
怎样写游记·····	商友敬(191)
后记·····	(203)

作文要道

叶圣陶

诸位同志是研究写作的。写作跟文学创作之间不能画等号。写作的范围很宽广，写调查报告，写工作计划，写经验总结，写信写通知等等，都包括在内，当然也包括文学创作。工作和生活中经常需要写作，所以写作是每个人非学不可的，而且是非学好不可的。文学创作就不是这样，有积蓄有兴致的人不妨去创作，没有什么积蓄和兴致的尽可以不创作，并非大家都得创作。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能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能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

文章怎么写？鲁迅先生有一篇《作文秘诀》，把怎么写文章概括成四句话，总共十二个字，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四句话，头一句“有真意”是最主要的。你没有什么真要说的值得说的意思，又何必徒劳呢？确乎有真意，果真非写不可，还得注意后面的三句话，因为粉饰、做作、卖弄，都是表达真意的挺可厌的障碍。

此篇系作者于1981年8月7日同《写作》杂文编辑人员的谈话。

没有真意就没有必要作文，这个道理很简单。譬如写信，如果没有有什么事儿，没有非说不可的话，何必随便敷衍几句，浪费四分或者八分邮票呢？信总是有话要说才写的，或者告诉对方一些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向对方请教，跟对方商量。这些就是“真意”。写小说跟写信好像完全是两码事，其实一个样。假如平时没有什么积蓄，没有从个人和社会方面深入体会到的某些东西，提起笔来又没有强烈的兴致，觉得非把某些东西告诉读者不可，那也无妨放下笔来，暂且不写小说。假如硬要写，那就像没事写敷衍信，徒然浪费四分或者八分邮票一样，未免有点儿无聊。

有了真意，要把文章写好，当然还得讲究点儿技巧。讲究技巧，最要紧的是选择最切当的语言，正确地把真意表达出来。鲁迅先生没有从正面说，只是提醒人们要“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因为这三种毛病是最容易犯的。有的人以为讲究技巧就是要追求这些东西，凭着这些所谓技巧，即使真意差点儿，也可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来。我可不敢相信技巧能补救真意的想法，何况鲁迅先生所说的粉饰、做作、卖弄，根本上不是什么技巧。

我国的骈文讲究对仗，讲究词藻，讲究运用典故和成语，借那个来说这个，可以说集粉饰、做作、卖弄之大成。现在没有人写骈文了，可是骈文的这些毛病还有人犯，往往犯了不知道是毛病，甚至自以为得计。滥用形容词语和形容句子就是一条，以为用得越多文章越漂亮。摆起架子来写文章又是一条，以为顺着一般人的表达习惯来写就不成其为文章，必得说些奇离古怪的话才行。不管有没有需要，在文章里塞进些滥俗的成语或者典故也是一条，以为非此不足以表

现自己比别人高明。列举不尽，就此为止。总之，鲁迅先生这四句话，到现在还着实有用。咱们把这四句话记在心里，经常用来提醒自己，对写作必然大有好处。

这四句话其实是作文的要道。当时有人写信给鲁迅先生，问作文有什么秘诀，所以他用了“秘诀”这个词儿，并不是说作文有什么“秘密”或是“神秘”的意思。

说“达”

吕叔湘

近来翻阅苏东坡的文集，看到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谈到写文章，一再引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辞达而已矣。”他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答王庠书》）。什么叫做“达”，他对此有解释，他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答俞括书》）。他又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书》）。你看他，把一个“达”字说得那么难！

按苏东坡的意思，“达”有两个方面：一是“所达”，就是他所说的事物固有之“理”；一是“能达”，就是“辞”。也可以说是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能对所要表达的事物有深入的认识，还要能够用恰当的言语把这个认识表达出来。苏东坡所说的“固有之理”或“物之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事物的本相，事物的真实性。文艺理论里的“写真实”含有不回避真实的意思，涉及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如

果撇开这一层意思，那末，写真实是适用于一切文章的写作的。

是认识事物的真实难呢，还是把这个认识说清楚、写清楚难？照苏东坡的说法，“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似乎表达比认识更难。其实不然。“了然于心”是“了然于口与手”的前提，认识不深入，不真切，怎么能表达得好呢？即使你有本领把你的认识不折不扣地说出来或写出来，仍然免不了粗糙的，肤浅的。写文章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追根究底还是由于没有想清楚，也就是对事物的真情实况没有认识清楚。比如两个形容词决定不了用哪一个，并不是这两个词本身有什么难于取舍，而是决断不下哪一个词更符合事物的真实。这是最简单的例子，比这复杂得多的问题有的是。相反的情形有没有呢？当然也有，要不怎么会有“非言可喻”，“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甚至“言语道断”这类话呢？然而这毕竟是少数情况，多数情况是说不清楚由于认识不清楚。总而言之，认识事物的真实的确是谈何容易。

说到“真实”，我不避拆字的嫌疑，还想把这两个字分开来讲。“真”是真情，是本质，“实”是实况，是外貌；实是真的基础，真是实的提高。真比实更重要，可是离开实也很难得到真。画像有貌似与神似之分，貌似是实，神似是真。顾恺之给人画像，最后在脸颊上给人添上三根寒毛，这个人立刻就活起来。然而要是他没有先把脸形画得差不多，光有那三根寒毛也活不起来的。超现实主义者在实外求真，多数人接受不了。

把这个道理应用到写文章上来，写一个人不仅是要写他的音容笑貌，写他如何工作，如何娱乐，更要紧的是要写出他的内心世界。倒不一定要通过大段的“意识流”的分析，却往往在一两句话、一两件小事情上流露出来，抓住这个，一个人就写活了。古人之中，司马迁最擅长这一手，^①后世的史传文章连篇累牍，很少能比得上《史记》里的二三千字甚至几百个字。我们记住一些有名的小说中人物，也无一不是首先想到他的某一两件事或某一两句话。同样，写一件事情，光写出前前后后的若干情节是不够的，要能把这些情节的内在联系交代清楚。写风景，也不能光写山是如何的青，水是如何的绿，要能写出它所以能叫人流连忘返的奥妙。因而写人就需要直接间接地跟他交朋友；写事就要周諮博访，去伪存真；写景最好是住在那里一段时间，经历些个风晨雨夕，寒往暑来，一句话，得在认识上下一番功夫。光靠字斟句酌是不解决问题的。

议论文字是不是也适用这个道理呢？是不是只要持有正确的论点，或者叫做站对了正确的立场，文章的好坏全凭一支笔呢？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因为首先要知道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而这是要自己去辨别，不是可以请别人，不论是古人或今人，代作主张的。议论文字比别种文字更难写，不但是要对所议论的事物有足够的认识，还要对与此有关的事物有足够的认识，弄清楚这些事物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作出价值判断，才能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到了最后阶段，把自己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一切依据条分缕析地说给别人，使他不得不信服，这也比写别种文字更难。但是关键仍然在于取得对事物的真实即真理的认识。否则纵使你有如

簧之舌，生花之笔，也只能鼓惑于一时，不能欺人于长久。不信，请看罗思鼎与梁效。

所以，写文章不仅仅是一个写的问题，这里边还有一个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问题。凡是认识不清，或者不肯、不敢认识清楚，或者不肯、不敢照所认识的去写，都是不会写出好文章来的。

谈“文成于难”

何其芳

中国过去有所谓才子。才子的特点不仅在他文章写得好，而且主要在他文章写得快。清朝有个批评家叫金圣叹，却在这点上作了一个相反的说法，他说真正的才子并不是“文成于易”，而是“文成于难”。难到什么程度呢，他用八个字来形容：“心疾气尽，面犹死人”。用这里老百姓的话来说，大概就像做了大苦营生一样。

金圣叹根据他这种理论去批《水浒传》，就认为处处都是作者煞费苦心的结果，加以许多解释和赞美，结果有些地方不免失之穿凿。但不管他应用到批评发生了什么流弊，他说“文成于难”还是有道理的。

写文章有两个难：一个是难得内容完全正确；再一个是难得表现形式能够吸引读者群众。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讲：“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ABC。”我想这就是讲的第一个难。这是写文章的根本问题。金圣叹所看到的还不过是第二个难，即文章的写作技巧方面。这自然是次要的问题。但要做到季米特洛夫

所规定的标准，“使每个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也的确不容易。

知道写文章不容易有什么用处呢？我想是有用处的，可以使我们写文章多花点心思，写得正确一些，有效果一些。在这点上我们就和金圣叹完全不同了。他强调“文成于难”，是为了吓唬人。他说书太多可以使天下乱，而他又没有权力像秦始皇一样烧书禁书，所以把《水浒传》等加以批点，说明里面处处都是作者惨淡经营之笔，这样来把人们打算著的书吓得不敢著，已经著出的书也一律打倒。他的目的自然并没有达到，而这种怪想法却不过反映了中国过去的读书人的一种垄断文化的思想。不用说我们的文化教育工作的目的刚刚和他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读能写，而每个革命干部尤其需要掌握写文章这个武器。因此，说写文章不容易，对于初学作文的人是不适宜的。对于他们倒是应该首先强调写文章并不难。我们有的国文教科书上说，“怎样想就怎样说”，“怎样说就怎样写”，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对于已经会写文章，要求在写作水平上提高一步的人，却应该让他们知道要把文章写得又正确又效果好，也并不是这样容易。“想”虽然是从客观事物来的，但到底是主观的认识，有和客观事物一致的时候，也有和客观事物不一致的时候。“写”虽然是从说话来的，但到底是一种高级的表达形式，有和说话一致的地方，也有和说话不一致的地方。就是说话，也有日常的谈话和开会时的发言、报告、演讲之分，后者就比前者提高了许多，而写文章还应该更精确，更集中，更加工。写文章之难，就主要在于要克服这两个不一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难，并且不怕这个难。